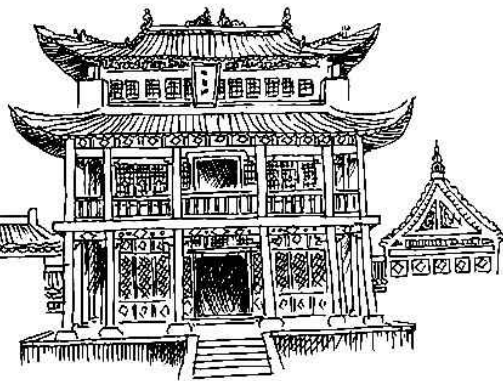


## 钟楼街史话之

## 千年街史略钩沉

## 7 “察院”与察院前街

王继祖 王琛



国家设立监察机构,是保证官僚队伍的廉洁,增强执政能力的必须,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必须。朱明王朝的监察机构,相较于其他王朝,有过之而无不及,这不仅与国家需要的原因,还增加了一点朱家创业皇帝朱元璋疑忌之心颇重的心理因素。

据《明史·职官》载,明初的国家都察院,设左、右都御史,并设置了针对13个省的“十三道监察御史”,专门监督省、府、县各级官僚。为保证其监督效果与力度,又建立起“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”。仅山西行省(后改为承宣布政司)便设置“监察御史”8人。这8名监察御史并不常驻山西,而是在京待命,直接受皇帝调遣,凡受命巡视任务,则挂“御使巡按”之衔,“代天子巡狩,所按藩服大臣、府州县官诸考察,举劾尤专。大事奏裁,小事立断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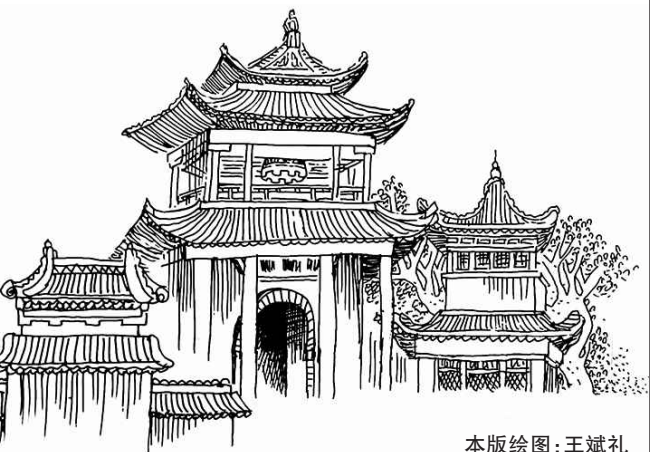
因为监察御史不是驻省官员,凡出巡理事均受皇帝差遣,而且,每来必带专有之任务,所以,明初行省不设监察御史衙署,凡奉命而来,住吃均由布政司使安排,或自寻料理。明初皇太子朱标巡视山西,拘走晋王,便临时驻节于晋省“太子府”,这个太子府就前临钟楼街(后文专述)。及至明景泰年间,明代宗偶接奏疏,言朝廷所派监察御史巡察地方时,行止无衙署,一切均靠行省吏员安排,日久天长,难免疑窦丛生。朱家皇帝代代疑忌之心颇重,乃成祖传家风,代宗朱祁钰又是“土木之变”后非常规登基即位之君,对封疆大吏、地方高官,心中常怀警惕。闻奏,正引起其心中块垒,深恐地方大员与御史吏员暗通款曲,遂诏令诸省,在省会之城起建“御史监察行署”。山西巡抚接诏,立即依帝令,严按朝廷规矩,选太原南市街(旧马市)之东无名僻静小巷,建起了省城第二大衙门“巡按御史察院”,简称“察院行署”,或“察院”。于是这条无名小巷得名“察院街”。

光阴倏忽,眨眼120余年过去。万历八年(1580),深藏小巷察院街的“察院行署”忽生火灾,灾情不详,却波及离此尚有一段距离的城中的“钟楼”。对于这次察院失火,官民均视为大事,地方志乘多有记载,甚而至于认为是天降示警。万历《太原府志·灾祥》云:“八年,省城察院灾,后改为太子府,钟楼移于泰山庙前。”乾隆《太原府志·祥异》载:“八年,彗星见于东南,太原府诸县大疫察院火。”清康熙、道光《阳曲县志》也有“(万历)八年,彗星见于东南,察院灾”等记载。这些志乘之述,都把察院的火灾列入“灾祥”,当做太原历史上的大事,载入史册,可见影响之大。至于灾情,均无细述。不过,从古人把察院之火、察院迁址重建、钟楼迁址重建联系在一起,当做一同发生之事,则可以想见,从今晋府店到今大中市一带,均应该是火灾祸及之地,或灾情所出之讖语延及之域。

火灾之后,察院从察院街迁走了,迁到了太子府故地。太子府故址在什么地方?在太子府巷东,太子府巷就是后来钟楼街上的靴巷。康熙《阳曲县志·街巷》有载:“太子府巷,一名靴巷。”史载告诉我们,万历八年旧察院因火灾而迁址,迁到了当年称为太子府巷之东的“太子府”,搬到钟楼街上了。这是钟楼街以及过往的东门正街,首次驻上了官家衙门,而且是一个大衙门。

火灾后的察院废墟给了晋王府,晋王府想赚钱,建起了商店。这个商店起名时,为了防止再生灾害,取名“永安店”。但是,城民都知道这是晋王府开的店,就叫它为“晋府店”。叫来叫去,“永安店”没有叫响,“晋府店”却越叫越响,尽人皆知,甚至叫成了一条街巷名“晋府店巷”。渐渐地,“察院街”“旧察院街”销声匿迹。

钟楼街上有“察院衙门”,街名还能叫钟楼街吗?原本是顺势而为之事,改一个有关“察院”的街名便可。但是在察院搬来不久,明初所建大钟楼拆毁,移址同街中段北侧泰山庙对面的街南重建。虽然规制和体量都小于原来的大钟楼,但是,毕竟是独立鸡群之鹤,仍然是个大建筑。于是,原来的一条钟楼街一分而二,以老鼠窟为界,之西,用监察御史衙署“察院”命名,叫做“察院前街”,后演变为“察院街”,至于察院后门的那条街,便名“察院后街”;老鼠窟之东,仍名“钟楼街”。



本版绘图:王斌礼

## 8 傅霖《重建钟楼说》

明代中叶嘉靖年之后,山西省首邑、太原府驻地阳曲县的傅氏家族日见兴旺。这个傅家正是后来扬名晋省,知名天下的傅山之家族。傅氏祖籍大同,后徙忻州,再迁太原,入籍阳曲,自誉为殷商名相傅说之后。自傅山六世祖傅天锡作临泉王府教授,其子傅朝宣来临泉王府看望父亲,被宁化王府相中,强逼入赘为婿,成了宁化府的仪宾、承务郎。这个傅朝宣便是傅山的曾祖父。傅家饮誉省城的率先人物,是傅山的祖父傅霖及其两个弟弟傅霁、傅霏,时称“傅氏三凤”。傅霖其人,为明嘉靖壬戌(1562)科进士,名在二甲。入仕后兢兢业业,为政清廉,颇有政绩,后被严嵩之党攻讦落职。返籍后尚义活众,解囊济贫,率众建文峰塔,义举不穷。曾有遗世之作《重建钟楼说》,成为钟楼街史话绕不过去的史事。

## 《重建钟楼说》试析

傅霖之《重建钟楼说》(后简称《说》)非记、非序,而以“说”名之,想“说”什么?文字五百余,行文颇离奇,凡涉及之人都不具名,只作“某”;凡涉及之时间,均不具月日,一律为“某年某季”。看似随意为之,实是有意避之!个中迷团令人费解。为使钟楼重建之缘由昭示后人,试析于后。

前文说过,万历八年,省城监察御史衙署“察院”忽遭火灾后,迁址钟楼街太子府为新署。与察院同期稍后迁建的还有省城之大钟楼。为什么察院失火会殃及钟楼呢?它们可是隔有一街之距的。被殃及之钟楼,损坏情况如何?不见志乘一字之载,亦无一言之述。为何?为什么察院迁址建新署,钟楼也迁新址、建新楼?官衙和钟楼又无必然之关系。数部明、清两代府志、县志,对万历八年火毁高衙察院之事,颇为重视,均有记载,多类列于“灾异”。但或简记寥寥,或语焉不详。为何?

时在晋省省城太原声望颇高的傅霖,既为钟楼之重建做《说》,或许弄清《说》文,是了解重建钟楼的一个捷径。

傅《说》开篇,“先是,岁在庚辰,钟师撤,故钟楼抑而卑之。四三年末疫病大作,饥馑洊臻,上自王子侯,下逮氓隶,愁苦叹息,声相属也。岌岌皇皇,哀死扶伤,欲叩帝间,不知其方。襁彼实沉,载祈台殆,默无以应,莫已其灾意者。业业危楼,一国之望,断而小之,或有攸关。”

用今天的话说,傅霖《说》的这段文字大意是:万历八年省城钟楼的钟师被裁撤,原因是钟楼抑而卑之。注意,此处所说的钟楼明明是“业业危楼”,何故被贬为“抑而卑之”?而且是“钟师撤”,即钟师被裁撤。之后的三

四年间,(太原)瘟疫肆虐,饥馑连年,上至王侯贵达,下至黎民百姓,悲愁哀号之声四起,哀死扶伤之景充斥。惊恐的人们,呼天不应乞地无门。禳祈山川河神实沉、台殆,也得不到回应。谁也不知是灾来何处,止日何时。高大巍峨的钟楼,你是晋国藩地之望啊(太原是晋国之王朱桐的藩地)。是否因你“断而小之”,而引来了“瘟疫”“饥馑”?

傅霖之《说》,虽无一字涉及“察院”之灾,只说钟楼日渐暗淡,受人贬责,甚至撤裁了钟师。这些却起于万历八年,与察院火灾同年。随之瘟疫饥馑连年不止,提出了问题之所在:“业业危楼,一国之望,断而小之,或有攸关。”

于是,人们带着这个问题去询问“堪舆家”,询问“阴阳家”,询问于“儒者”,直至请示于父母官“郡县”,请示再高一级的省级大吏“藩臬”。非常滑稽的是,各有各的说法,都有自己的道理,最终都是让人一头雾水,不得要领。尤其是晋省最高长官,藩台——布政使、臬台——按察使,大言不惭地对请示他们的人说:“固吾济所同欲矣!”我们这些作官的和你们的想法一样啊!也是不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比较遗憾的是,对这两位晋省高官,没有提到姓名。

于是,人们又去请示“直指使者”。“直指使者”是何许人也?是“朝廷设置的专管巡视、处理各地政事的官员”。傅霖在这里又玩起来黑色幽默,他不说直指使者何名何姓,而只说“使者某公曰:爱谿爱语,实烦民好;吾之与之,四达声教。惟汝朝夕从事,吾且观其成焉。”

意思是,我愿意采纳大家的意见,你们说得很好。请你领人们干吧。我乐观其成。看起来率领众人行事者,就是《说》文之撰者傅霖,直指使者一句“惟汝朝夕从事”,这个“汝”应该就是傅霖了。

傅霖是从官场出来的,他听了“直指使者”之言,唯恐不把握,最后率众找到了受皇命而巡察山西、巡察晋省高官的御史大夫。御史大夫某公曰:“钦若昊天,敬授民时,固王政之先务,守臣所乐知,敢不汝听。”这位钦差御史之言,更是冠冕堂皇,用《尚书》中的话“钦若昊天,敬授民时”作引子,把早已非官的傅霖当作地方官吏鼓励,似乎不是民众在请示他,而是他急众之急,以敢不从命而勉之。

于是,太原城的拆旧钟楼和建新钟楼之事,就在傅霖率众的努力下,在万历八年察院之火殃及钟楼之后的第四年即万历十一年“癸未之秋”后,另选新址于钟楼街中段南侧,与泰山庙隔街而对,启建。很有可能材料的来源,主要是“业业危楼”的旧钟

楼。为什么要选址于距旧钟楼不远的同街而建呢?或许是因钟楼街之名所困;或许是为了拆旧楼而运输材料,就近而方便;或者是重风水,建在新迁的察院之南,为辅助察院兴盛。当然还有可能有很多“或许”,今已不得而知,待以后有兴趣者一一拆解。

## 重建钟楼之谜

非常耿直的傅霖在《说》文中一改秉直之性,有意留下无尽的谜团。最令人难解的是《说》文回避一切官员之名,回避官、竣工时间的“说”法:“于是,以某官某董其事,而以某官、某某官、某分任焉。经始于某年某季,迄工于某年某季。”或许此文名《重建钟楼说》,正是因为“说”可随意之“说”,而若名《重建钟楼记》,则一个“记”字,如何能用这么多“某”“某某”了得!

钟楼街上的“钟楼之谜”太多了,主要的谜有五:

一是诸多太原府志、阳曲县志,在讲到钟楼的迁建时,都与“察院”失火绑在一起。有的说:“省城察院灾(着火),后改于太子府,钟楼移于太(泰)山庙前。”也有的说:“钟楼,旧建于寿宁寺(打钟寺西),后因旧察院回禄(火灾),改移泰山庙前。规制若城(楼)小”。还有的说:“旧察院万历年火毁,改建太子府,钟楼因移改于泰山庙前。”而当时的见证者傅霖却含混其词,不仅不予明记,反而有意规避,一篇《说》文,只字不涉,这是何因?

二是,重建钟楼,归因于察院失火后的几年间“瘟疫大作,饥馑洊臻”“业业危楼,一国之重,断而小之,或有攸关”。似乎是察院失火,钟楼撤掉钟师,钟楼“抑而卑之”,因之而遭来瘟疫、饥馑。如是,那一定是所谓建筑风水问题。何故而不直说,而是绕来绕去!地方官则闪烁其词,不敢拍板,直到寻至“直指使者”“御史大夫”那里,才使得重建钟楼之事有了着落,这是何因?

三是,傅霖之《说》,有意隐去重建钟楼主事之官的姓名,率众施建者的姓名,开工之时间,竣工之时间,这是何因?

四是,察院之火,波及钟楼程度如何,古代志乘无述无载,已成千古之谜。但钟楼却与察院之火缘深难解,以至相距时间不长,向着一个方向迁址、迁建,这又是何因?

五是,须知,傅霖率众请示的最后一位高官是“御史大夫”,“御史大夫”正是火灾察院的当家人,拆大钟楼,迁址重建,“断而小之”,实实在在是他点的头。这又是何因?

这些都成为有待后人去探索、思考、研究和考订的待解之谜。如若一朝拨开谜团,破解谜底,定有引人入胜之史话。